

全球智库半月谈

美国加征关税旨在抑制中国的技术崛起

如何悄悄地提高对中国的关税

欧盟在全球贸易战中如何定位

贸易战的最大危害是什么

特朗普财政刺激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合资企业和技术转让：来自中国的新证据

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发表五十周年回望

本期编译

安婧宜

曹园

丁丽伟

侯书漪

单敬雯

史明睿

申劭婧

熊春婷

伊林甸甸

杨茜

张舜栋

朱友明

(按姓氏拼音排序)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承担的编译项目，每半月定期发布。所有稿件均系网络公开文章，由项目组成员依据当前热点编译组稿。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 任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 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史明睿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 长 张宇燕

召集人 徐 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 史明睿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联系人: 许怡 邮箱: naonao0619@163.com 电话: (86)21-50815287 传真: (86) 21-50815265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24 楼 2409 邮政编码: 200122

免责声明:

《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美国加征关税旨在抑制中国的技术崛起 7

导读：美国宣布对来自中国的 1333 种产品加征 25% 关税，这是近期第三次对中国加征关税。美国增税的真正战略意图是遏制中国的技术崛起。中国对美国的报复性增税由第一次的 30 亿美元的无痛报复，转为第二次的 500 亿美元有代价报复。美国能否实现遏制中国技术崛起的目标取决于其他发达国家是否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如何悄悄地提高对中国的关税？ 9

导读：虽然特朗普政府对对中国产品增税已成为头条新闻，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其他国家也提高了对中国贸易的关税。本文探讨了 2012 年欧盟取消中国普惠制国家的影响。由于这一举措，从中国进口的总价值 2430 亿美元的产品进口关税升高，欧盟海关收入提高了约 40 亿美元。

不只是大豆，中美双方的贸易战清单 14

导读：4 月初，美中两国对进口关税提出了新一轮针锋相对的提案。本文将两国拟议的关税清单与贸易统计数据进行了匹配，以得到受新关税影响最大的产品和行业及贸易额。

欧盟在全球贸易战中如何定位？ 17

导读：为应对美国对全球贸易的挑战，欧盟是时候着手做一些实事而不仅仅停留在空想。随着多边体系出现第一道裂痕，欧盟很难在中美之间维持中立。

中美贸易摩擦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20

导读：中美贸易摩擦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两国各自的报复清单都涉及了哪些产品？双方报复措施背后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作者认为，美方的目标在于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而中方的目标则在于给美国迅速的对等报复。

贸易战的最大危害是什么？ 22

导读：中美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引起了各界的广泛担忧。在上周的演讲中，IMF 总裁拉加德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忧虑。作者认为，危害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还不是全面贸易战将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贸易战对人类社会最大的威胁，是其可能颠覆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国际秩序，从而使世界各国再次陷入冲突与混乱之中。

特朗普财政刺激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24

导读：2017 年年底在美国颁布的大幅减税政策和今年 2 月颁布的一揽子支出计划预计将为美国今年的经济增加 2760 亿美元的财政刺激，占 GDP 的 1.4%，但是对美国经济增长

的实际影响可能会低于当前水平。正如这篇博客所述，财政刺激对经济活动和产出的影响随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变动。对特朗普刺激措施影响（即“乘数效应”影响）的现有预测忽略了一个事实——美国经济几乎已经充分发挥了潜力。根据美国当前经济状况，如果不考虑这一维度的话，我们预测到 2020 年，特朗普财政刺激措施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额外再增长 0.5% 而不是 2.1%。

聚焦中国

合资企业和技术转让：来自中国的新证据 29

导读：中国政府要求某些行业的外国投资者与国内企业组建合资企业。该专栏使用了 1998 年至 2007 年在中国所有合资企业的数据集，以表明在鼓励外国投资者转向国内业务方面，这项政策取得的成功。在外资转向国内业务方面，本研究找到了实证证据来证明至少存在三种渠道。

经济理论

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发表五十周年回望 33

导读：1968 年三月，在美国经济学会就职演说之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的作用》刊登在《美国经济评论》上。五十年过去了，经济学家们仍在反思这篇著名的文章。

战略观察

板门店和谈：新的开始还是旧事幻现？ 35

导读：当地时间 4 月 27 日，朝韩首脑会晤在板门店举行。金正恩与文在寅进行了热情洋溢的会谈，表示积极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合作，实现半岛发展。本文作者认为，并不能由此就判断出朝鲜半岛就此出现和平发展的新局面，还将面临现实的考验，而这需要美国方面的配合，也可能需要中国。

面临危机的准则：持续使用化学武器的影响 37

导读：日前，叙利亚境内杜马地区发生使用化武并造成平民伤亡事件的报道，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俄罗斯认为此次袭击事件系凭空捏造，对此，禁化武组织已经要求事实调查组对有关报道进行调查。作者认为，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准则正在面临危机，人类即将倒退回一个充满非人道的战争工具的时代。国际社会应当寻求更为有效的办法，追究肇事者的责任，阻止进一步的化学武器袭击。

特朗普的缺席可能使美洲峰会免于困境 39

导读：当地时间 4 月 13 日，第八届美洲峰会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由于近年来拉美地区高涨的反腐形势，“反腐败”成为本次峰会的主题。然而，美国作为曾经大力支持拉美地区反腐败活动的国家，其总统特朗普借故缺席了此次峰会。本文作者认为，特朗普执政以来已

经明显削减了在反腐方面的工作力度,但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总统的缺席将不会影响拉美地区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尽管步伐缓慢,拉美国家将在选民的推动下更多地实现本届峰会的反腐承诺。

本期智库介绍 42

美国加征关税旨在抑制中国的技术崛起

Alicia García-Herrero/文 史明睿/编译

导读:美国宣布对来自中国的 1333 种产品加征 25% 关税,这是近期第三次对中国加征关税。美国增税的真正战略意图是遏制中国的技术崛起。中国对美国的报复性增税由第一次的 30 亿美元的无痛报复,转为第二次的 500 亿美元有代价报复。美国能否实现遏制中国技术崛起的目标取决于其他发达国家是否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编译如下:

中国为了平息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所做的让步(承诺开放部分领域,并使人民币升值),似乎并没有使美国白宫停止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继今年早些时候两次上调进口关税之后,美国宣布对来自中国的 1333 种,总估值约 600 亿美元的产品上调 25% 关税。

本次第三轮增税的理由不再是危害国家安全(对钢、铝增税)或保护国内产业(对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增税),而变为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在短短几小时后,中国由最初对部分进口自美国的农产品进行增税报复(30 亿美元),转为对 106 种,总价值约 500 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更重要的一点是,本次增税的 106 中产品不仅仅局限于低端产品,而是包括了飞机、汽车等高端产品。

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战略已经逐渐变为从更有针对性的方面缩小双边贸易逆差,达到限制中国工业进步的目的。美国已将大部分盟国从钢、铝的关税上调中排除,并且只对中国采取了保护美国制造商知识产权的关税措施,以上两点都可以说明美国的战略意图。

更重要的是,在本轮美国增税的 1333 种目标产品中,约 70% (按统计)是高端制造商。换句话说,美国政府的最新举措就是为了损害中国制造业升级,即损害中国制造 2025 战略计划。与此相对,只有 3% 的低端进口产品被纳入美国的名单,这进一步支持了关于美国最终目标的论点:遏制中国的技术崛起。

中国的反击显然已经从最初的羞怯试探变得更具攻击性(从最初的 30 亿美元到最近的 500 亿美元),并且打击范围加入了另一组截然不同的产品。仔细分析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及行为背后的代价。

我们认为,中国能实现有效报复的进口产品应该符合两个关键条件:首先,中国是这种产品巨大的消费市场,这样可以对美国特定部门的出口商造成实际损害。其次,美国不是中国这种产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国。现实情况是,只有少数产品,即木材、芳香烃混合物和废铜符合这两个标准。换句话说,中国执行无痛报复的能力非常有限。中国 30 亿美元的报复清单与无痛报复的想法完全一致,但对于 500 亿美元的报复清单来说,却涵盖大量主要从美国进口的产品。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在针对 1,333 种产品增税的清单中已经暴露了真实意图，那就是通过限制中国高端产品出口来遏制中国的技术崛起，迫使中国以更痛苦的方式提高风险或进行报复（遏制来自美国的高端产品进口）。虽然美国的行为会降低中国技术赶超的速度，但是更取决于其他发达国家是否效仿美国对中国采取保护主义行动。在这方面，不仅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非常重要，而且中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关系也非常重要。

本文原题为“US Tariffs Aim to Contain China’s Technological Rise”。本文作者 Alicia García-Herrero 为 Bruegel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4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如何悄悄地提高对中国的关税？

Stefan Legge, Piotr Lukaszuk, Simon Evenett/文 杨茜/编译

导读：虽然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产品增税已成为头条新闻，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其他国家也提高了对中国贸易的关税。本文探讨了 2012 年欧盟取消中国普惠制国家的影响。由于这一举措，从中国进口的总价值 2430 亿美元的产品进口关税升高，欧盟海关收入提高了约 40 亿美元。编译如下：

近期，贸易政策的热度一时无两。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可能对来自中国，总额约 1600 亿美元的产品提高关税（Keynes and Bown, 2018）。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其他贸易伙伴也提高了对中国贸易的关税。全球贸易预警组织文件显示，中国的出口产品自 2014 年开始就面临关税增长（Evenett and Fritz, 2017），早于特朗普总统当选美国总统。贸易政策效果受到公开透明的政策变化的影响，但也有部分政策干预不易被发现。

本文中，我们记录了在当前讨论中被忽视的两个现实问题。第一，2013 至 2015 年间，欧盟把中国从普遍优惠制（GSP）中排除，对中国产品提高关税；第二，因为关税占欧盟总体预算的相当大份额，所以欧盟不能轻易降低关税。按照我们的估计，把中国从普惠制国家中排除，给欧盟带来了约 40 亿美元的额外关税收入，而 2016 年脱欧前的英国对欧盟关税的净贡献也只有 120 亿美元左右。

促进中国发展与收取更高的关税

为了理解欧盟如何提高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我们首先要了解世贸组织成员国认同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简言之，这一原则规定，任意国家承认的最优惠关税都适用于其他所有 WTO 成员。例如，对同一种进口产品而言，欧盟对中国产品的税率不能高于对美国产品的税率，反之亦然。自由贸易协定（FTA）和普遍优惠制度（GSP）允许偏离最惠国待遇原则。普惠制是一个正式的制度，可以使国家免除世贸组织的一般规则限制，允许对穷国降低关税，同时不降低对发达国家的关税。重要的是，可以由国家单方面决定哪些国家和产品可以享受普惠制，而其他国家和产品使用最惠国税率。

具体分析欧盟的情况，2013 年中国出口欧盟的产品中的 60% 享有 GSP 低关税优惠。然而，2012 年 12 月，欧盟宣布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大部分中国产品的 GSP 优惠，理由是中国产品在欧洲市场上极具竞争力。除此之外，因为中国不再满足世界银行规定的连续三年中低收入国家的条件，所以把中国从普惠

制受益国清单中删除（《欧盟条例》第 4.1(a)条第 978/2012 号）¹。由此，中国对欧盟出口开始面临更高的最惠国关税待遇。

描述性统计显示，2017 年欧盟的最惠国关税平均为 4.2%。而欧盟普惠制关税平均值为 1.96%。需要说明的是，欧盟从中国进口的 98% 产品面临的最惠国关税税率低于关税峰值（15%）。在税目方面，4626 种中国出口产品中只有 102 种（6 位 HS 编码级下）关税税率等于关税峰值。比较最近公布的特朗普政府对 1300 个税目征收 25% 的关税，欧盟此举力度小得多，只有 17 个税目最惠国关税等于或高于 25%（受影响的产品是海鲜、酒和烟草）。

图 1 中国出口到欧盟商品的普惠制税率和最惠国税率累计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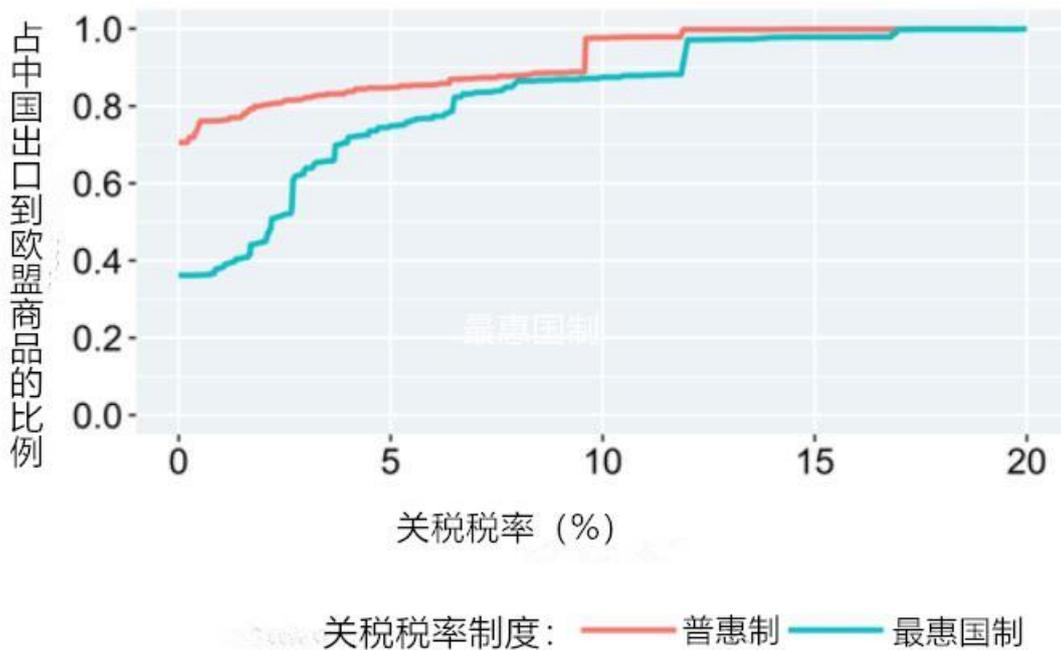


图 1 纵轴显示了欧盟进口中国商品的累计占比。数据表明，在普惠制下，大约 70% 的进口产品是免税的，而在最惠国待遇下，只有 38% 的产品免税。为了进一步说明普惠制和最惠国待遇之间的差异，说明哪些行业在双边贸易中受影响最大，我们在表 1 中把普惠制和最惠国待遇的税率与欧盟从中国进口最多的商品结合列出。

¹ 2012 年 11 月 20 日，欧盟的 GSP 改革生效。它将 GSP 受益人的数量减少到大约 80 个国家，同时扩大了受影响的关税额度(第 978/2012 号条例)。不久之后，欧盟委员会宣布了第 1213/2012 号法令，其中规定了符合 GSP 资格的国家特定行业的数量。2014 年 1 月 1 日，中国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最终，中国于 2015 年 1 月 1 日通过第 1421/2013 号法规，将中国从符合 GSP 的国家名单中删除。

表 1 欧盟从中国进口最多商品的普惠制和最惠国待遇关税

HS 类别	商品类别	欧盟 28 国 2015 年进口（单位：10 亿美元）	普惠制税率简单平均（最小值至最大值）	最惠国待遇税率简单平均（最小值至最大值）
85	电机	110.2	0.4（0—9.8）	2.5（0—14）
84	机械器具	78.0	0.01（0—2.2）	1.8（0—9.7）
94	家具、床、灯	17.8	0.2（0—2.2）	2.4（0—5.7）
62	衣服（非针织）	17.7	9.0（5—9.6）	11.3（6.3—12）
61	衣服（针织）	15.5	9.3（6.4—9.6）	11.7（8—12）
95	玩具与游戏	15.5	0.02（0—1.2）	2.3（0—4.7）
总计	所有商品	388.9	1.96（0—52.4）	4.2（0—74.9）

观察欧盟从中国进口超过 1 亿美元产品（6 位 HS 编码）的数据时，我们发现视频录制或重放设备、球轴承、部分的滚珠或滚柱轴承的关税大幅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总价值 25 亿美元的塑料制品（代码 392690）关税从零增加到 6.5%。总的来说，有 480 种超过 1 亿美元、34 种超过 10 亿美元的进口产品面临增税。

总体而言，基于 2015 年的数据，欧盟从中国进口的总价值 2420 亿美元的商品面临关税增加。这种不见波澜的关税增长覆盖规模甚至超过了特朗普总统 1600 亿美元的公开增税规模。

提高欧盟预算收入

我们认为，把中国从普惠制名单中去除，带来了明显的关税增加。

由于缺乏实际的关税收入数据，我们使用 WTO 报告的关税税率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进口值来估计欧盟从中国产品征收了多少进口关税。用于分析的数据集涵盖了 4600 种产品（6 位 HS 编码），我们知道这些商品的进口价值和最惠国待遇、普惠制从价关税税率。已知 2011 到 2016 年欧盟从中国的进口额稳定在 4000 亿美元左右，我们集中分析了 2013 年的进口数据，因为这一年是中国退出普惠制国家的前一年。

使用上述数据集和平均从价税，我们计算出，如果所有进口的中国产品受益于较低的普惠制关税，欧盟将收取 61 亿美元关税；如果最惠国待遇税制适用于所有从中国进口产品，欧盟将收取 129 亿美元关税。在 6 位数 HS 编码下分析关税最小值和最大值，我们发现普惠制关税收入的下限和上限为 5.5 美元和 68 亿，而对于最惠国待遇税制，收入在 11.1 到 148 亿美元之间。把中国从普惠制关税排除的关税效果预计为 68 亿美元（或介于 4.3 美元到 93 亿美元之间），这个数

字可能夸大了真实的效果。原产地原则阻碍了普惠制的利用，因此降低关税税率仅适用于进口产品中的一小部分。Nilsson（2011）认为，欧盟从 GSP 清单国家进口的 81.6% 的商品利用了普惠制原则，而 Keck 和 Lendle（2012）的文中认为，享受普惠制的进口商品有 63% 来自中国。

考虑到上述信息，把中国从普惠制国家中排除给欧盟预算带来了多大帮助？2016 年，欧盟总收入为 1322 亿欧元，其中关税收入占 15.2%，约 201 亿欧元。虽然发达国家的关税收入相对较小，但欧盟更依赖于这种收入。相比之下，美国关税和其他进口关税占税收收入的比例约为 1.9%。一般来说，国家越贫穷，这个份额就越高。欧盟 15.2% 的进口商品来自柬埔寨、布基纳法索等发展中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欧盟的进口关税是各成员国加总，用 20% 补偿行政成本，剩下的 80% 上报欧盟。图 2 显示中国从普惠制中排除之后，欧盟各国的关税收入大幅提高。

图 2 2007-2016 年欧盟关税总收入



2013 年到 2015 年欧盟关税收入从 20 亿欧元增加到 250 亿欧元，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必须研究欧盟贸易政策的其他变化是否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我们所知，2015 年 1 月起生效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自 2011 年 7 月暂时生效以来，情况不及预期。考虑到这一因素并假设原有 70% 产品适用于普惠制，中国适用最惠国待遇之后，欧盟预算提升约 40 亿美元。

展望未来，关税收入对欧盟预算的贡献可能会降低，欧盟对贸易自由化的积极性也可能降低，尤其是考虑到英国脱欧之后的关税收入损失。欧盟委员会 2018 年 3 月对外国互联网巨头的收入征收“临时”税是另一个商业政策导致关税变化

的案例。在建议税率为 3% 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预计“临时”税使来自外国公司的税收收入提高 50 亿欧元。如此“巨款”下，预计未来几年欧盟贸易政策的目标不会定为降低关税和自由贸易。

本文原题为“Raising Tariffs on China without Grabbing Headlines”。本文作者 Stefan Legge 为圣加仑大学高级研究员，Piotr Lukaszuk 为圣加仑大学博士，Simon Evenett 为 CEPR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4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不只是大豆，中美双方的贸易战清单

Chad P. Bown /文 单敬雯/编译

导读：4月初，美中两国对进口关税提出了新一轮针锋相对的提案。本文将两国拟议的关税清单与贸易统计数据进行了匹配，以得到受新关税影响最大的产品和行业及贸易额。编译如下：

4月初，美中两国对进口关税提出了新一轮针锋相对的提案，进一步加剧了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然而，潜在的担忧程度是未知的，因为每个提案都包含了可能受到影响的产品最低限度。本文将关税清单与贸易统计数据进行了匹配，以得到拟议的新关税可能将会打击的产品、行业和贸易总额。

特朗普提议的关税所涵盖的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价值在 2017 年约为 462 亿美元。受特朗普关税影响最大的行业是机器、机械器具及电气设备，价值 342 亿美元。北京提议的关税所涵盖的美国对华出口产品的价值在 2017 年约为 498 亿美元，受影响最大的行业包括交通运输设备（飞机和汽车）和蔬菜（大豆）。

1、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受特朗普 25%关税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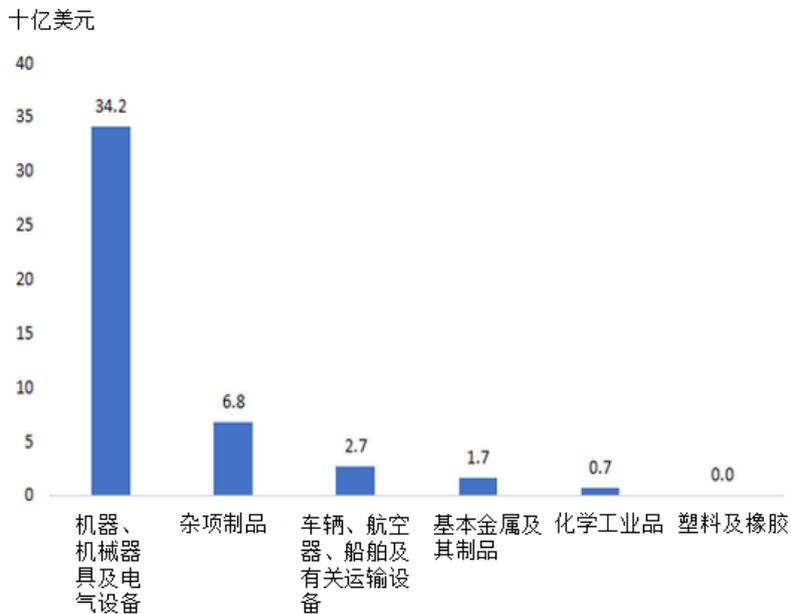
2017 年 8 月，特朗普政府根据《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行为展开了调查。2018 年 3 月 22 日，美国贸易代表处发布调查报告，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中国，我们将根据 301 条款采取贸易行动，可能约为 600 亿美元，但这只是我们所谈论问题的一小部分。”4 月 3 日，特朗普政府终于公布了拟议 25%关税的产品清单。

在产品层面上，本文将产品代码与 2017 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数据进行了匹配。特朗普提出的 25%关税所将涵盖的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价值在 2017 年约为 462 亿美元，略低于他在 3 月 22 日建议的 600 亿美元。

图 1 显示了受特朗普关税影响最大的行业。其中，机器、机械器具及电气设备达 342 亿美元；关税还将影响杂项制品（68 亿美元）和交通运输设备（27 亿美元）；有趣的是，这些关税还会对 17 亿美元的金属产品造成影响，包括 3 月 22 日已经生效的根据 1962 年“贸易扩张法案”第 232 条对钢铁和铝进口征收关税的措施。

在拟议报复名单的 1333 种产品中，进口额最大的产品（HS8 位代码）包括各种电视机（39 亿美元）、汽车（15 亿美元）、印刷机零件及配件（14 亿美元）和铝（11 亿美元）。

图 1 受特朗普 301 条款影响的美国从中国的进口（2017 年）



来源：使用 USITC Dataweb 美国进口数据；工业行业按照 HS2 位代码划分：机器、机械器具及电气设备（84-85）；杂项制品（90-97）；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86-89）；基本金属及其制品（72-83）；化学工业品（28-38）；塑料及橡胶（39-40）。

2、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受北京 25%关税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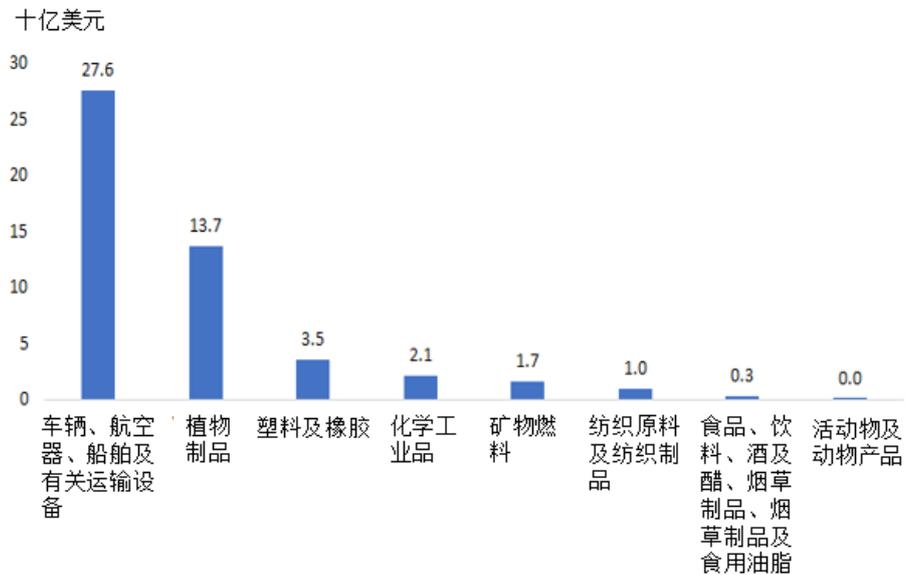
2018 年 4 月 4 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拟征收关税的产品，以回应特朗普政府的 301 条款关税。

由于中国的进口数据并未公开，因此本文将北京已公布的产品代码与 2017 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数据进行匹配。北京提出的 25% 关税所将涵盖的美国对华出口产品的价值在 2017 年约为 498 亿美元。

图 2 显示了受中国报复性关税影响最大的行业，分别是交通运输设备（车辆、航空器和船舶，276 亿美元）和植物制品（137 亿美元）；其他将受到打击的部门包括塑料及橡胶（35 亿美元）、化学工业品（21 亿美元）和矿物燃料（17 亿美元）。

其中，美国出口值最大的产品（HS6 位代码）包括各种飞机（163 亿美元）、大豆（124 亿美元）和机动车辆（100 亿美元）。

图 2 受中国报复性关税影响的美国向中国的出口（2017 年）



来源：使用 USITC Dataweb 美国出口数据；工业行业按照 HS2 位代码划分：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86-89）；植物制品（06-15）；塑料及橡胶（39-40）；化学工业品（28-38）；矿物燃料（27）；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50-63）；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制品、烟草制品及食用油脂（16-24）；活动物及动物产品（01-05）。

本文原题为“More than Soybeans: Trump’s Section 301 Tariffs and China’s Response”。本文作者 Chad P. Bown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和贸易谈判播客的主持人。本文于 2018 年 4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盟在全球贸易战中如何定位？

Guntram B. Wolff /文 侯书漪 /编译

导读：为应对美国对全球贸易的挑战，欧盟是时候着手做一些实事而不仅仅停留在空想。随着多边体系出现第一道裂痕，欧盟很难在中美之间维持中立。编译如下：

在最近一次欧盟各国政府的首脑会议——3月22-23日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上，与会各国都在担心全球贸易的未来。自从特朗普总统宣布对钢铁和铝的进口征收关税，并给予欧盟、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临时豁免权之后，基于强大多边体系的旧贸易秩序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

特朗普总统最近的任何公告都不应令人吃惊。事实上，他正是由于反全球化、反华和反德而当选的。他在竞选过程中还一再质疑整个多边体系的价值。与多数人的看法相反，特朗普的贸易观点遵循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哲学。事实上，他的价值观至少可以追溯到1990年在花花公子的一次采访中，当时，他认为美国应该对梅赛德斯奔驰征收关税。特朗普的言行与愿景是一致的。

特朗普上任后，首先执行的一项行动是宣称他打算让美国脱离《巴黎协定》。这一单边行动遭到欧盟和中国的坚决反对，并导致了他们去年在德国汉堡的G20宣言中孤立美国。

但是，德国外交部在维护国际气候协议方面的成功可能难以在贸易领域复制。事实上，孤立美国的贸易行为、并在面对美国阻力的情况下保护多边体系或许是不可能的，而且，多变体系中的第一道裂缝开始显现。

在加里·科恩（Gary Cohn）离开之后，特朗普团队中的其他人更加坚定地拒绝多边主义。特朗普最亲密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认为，所有导致美国贸易赤字的交易都应该重新谈判。与此同时，美国现任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也表达了他对世贸组织的蔑视，并且，他是探索世贸组织法律灰色地带的专家。通过以国家安全为由故意证明钢铁和铝关税是必要的，美国使得其他国家很难在WTO框架中成功挑战它所征收的关税，因为根据WTO的原则，成员国可以出于安全原因征收关税。

但美国向全球贸易体系提出的挑战远远超过钢铁和铝关税。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迫使欧盟加入它的队伍，并与之成为盟友一起对抗中国。在特朗普宣布将暂时免除欧盟的钢铁和铝关税的同时，他还决定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以应对所谓的知识产权盗窃和美中之间持续的贸易逆差。

欧盟应如何应对？迄今为止，欧洲理事会已宣布继续支持多边贸易体系，并希望欧盟获得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欧盟理事会也正确地宣布美国的关税是对钢铁产能过剩问题的一个不恰当反应，在这一点上，欧盟已经提出要与美国合作寻求解决方案。欧洲理事会还宣布，它已准备好采取符合 WTO 要求的适当的对策来回应美国的措施。最后，它表示非常重视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包括双方在安全事务的合作。

迄今为止，欧盟的回应是明智而又谨慎的。但同时也表明，欧盟难以在美国（其主要市场和第二大供应国）与中国（其主要供应国和第二大市场）之间保持中立。必须考虑的一个方面是安全性。出于对欧洲安全保障的重大关切，要严重破坏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是很困难的。

多边体系的第二条裂缝是，欧盟已经注意到美国授予的临时豁免，并希望它们成为永久性的。于是，这一正式宣言在获得豁免的国家和已被征收更多关税的国家如中国之间形成了隔阂。尤其是，欧盟是由于它自己的要求才得到了与中国不同的待遇，而北京不会忽视这一点。韩国也接受了豁免，日本则正在考虑抵制特朗普能维持多久。维护气候协议的统一战线在钢铁问题上没有再次联合，特朗普巧妙地设法用这些小的措施来割裂世界不同国家。

第三，随着受美国关税影响的中国和其他国家试图将其供给转向欧盟，欧盟的政治压力可能会增加，因为这增加了欧洲企业的竞争压力。欧盟仍会保持边界的开放，还是会因为巨大的游说压力而不得不提高关税？鉴于目前积极的商业周期和钢铁需求增加，这一风险可能不会很快出现，但随着美国关税的持续，压力肯定会不断增加。

总体而言，欧盟坚持现有的计划是正确的，该计划正在努力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并将美国和中国带回日内瓦的谈判桌。然而，特朗普的战略已经开始结构全球贸易体系，而欧盟目前还没有一个替代方案。

欧盟需要做的是更加关注其国内经济政策，以减少对全球贸易的依赖。这个战略并不容易。但只有当我们逐渐设法增加国内投资时，我们的经济才会变得不易受全球贸易冲击的影响。只有提高我们的安全保护能力，我们才会减少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依赖。只有我们加强了云计算和 5G 网络等系统数字领域的创新能力，我们才有可能在面对中美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时站稳脚跟。

现在是欧盟应该在全球贸易上做一些实事而不仅仅是空想的时候了。我们不应低估特朗普总统对我们繁荣与安全所提出的巨大挑战。

本文原题为“[How Should the EU Position Itself in a Global Trade War?](#)”。本文作者是 Guntram B. Wolff，他是 Bruegel 的主任。本文于 2018 年 4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美贸易摩擦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Alicia Garcia Herrero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中美贸易摩擦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两国各自的报复清单都涉及了哪些产品？双方报复措施背后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作者认为，美方的目标在于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而中方的目标则在于给美国迅速的对等报复。全文如下：

中美贸易摩擦正在以超乎外界预料的速度升温。但古往今来，一切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永远都是明确的，那就是：争端的双方到底想达成哪些终极目标？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总结了中美双方互相制裁对方的所有商品名录，并将其按照科技含量和所占出口比重做了分类。我们发现，美国宣称要制裁中国的关税总额，也就是 600 亿美元，要远远大于中国目前实际向美国出口的对应产品规模（见图 1）；而在这些被美国制裁的产品中，有 84% 都是高科技产品，而只有 3% 是低端产品（见图 2）。相较而言，中国的制裁名单要精确得多——其宣布制裁的 500 亿美元与我们估计的美国实际向中国出口的对应产品规模几乎是完全吻合的。不过，在中国的制裁名单里，有 50% 都是处于价值链底部的低技术产品。

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中共有 290 亿美元将受到美国新关税的影响，这相当于中国对美出口的 25%。在美国政府针对的所有中国目标中，有三大行业最为突出——首当其冲的是汽车业，其次分别是先进制造业（光学仪器、医疗设备等）和核反应堆。这三大行业占到了中国对美出口的 20.1%。而这些行业恰恰是中国试图在未来几十年间快速增长，并迅速提升技术水平的行业。此外，美国对华的制裁名单中还包括了那些中国虽然目前尚未达到世界领先，但已经取得了飞速的技术突破的战略性行业，例如国防产业和航空航天。这也意味着，美国此轮对华制裁的重点并不在于贸易不平衡，而是在于阻挡中国的技术进步。正如我们在此先的报告中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制造 2025” 计划是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目标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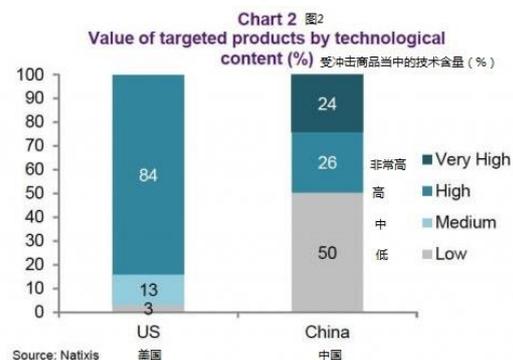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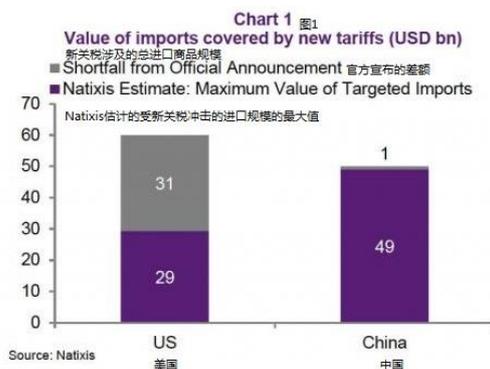


图 1 和图 2 中美双方的制裁措施涉及的贸易规模和产品技术含量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政府。对于中国而言，迄今为止其反制措施似乎都是总量意义上的对等报复。中国的制裁名录包括了美国对华出口的前几大商品——大豆、飞机和汽车，这些受影响的美国产品占到了美国对华出口总额的 29%。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农产品（大豆和谷物），占对华出口的 11.6%；其次是航空器，占 9.4%；再次是汽车业，占到了对华出口总量的 8.9%。

除了上述提及的商品外，中国还对部分来自美国的矿物燃料和塑料产品征收了惩罚性关税。不过，作为美国对华出口的第四大产品，来自美国的半导体却没有被列入中国的制裁名单。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快速发展的科技行业急需这类基础产品。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制裁名单覆盖了大量的初级产品，因此中国制裁政策的影响将会是直接而短暂的。

不过，中国较为依赖上述美国产品的事实也意味着中国的报复措施将伤及其国内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举例来说，美国每年向中国大量出口汽车。事实上，中国每年进口的所有汽车中有 28% 来自美国，而中国最新的报复政策将使其关税再提高 25%。有趣的是，中国的领导人曾多次承诺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李克强总理前不久在人大还专门再次强调过。显然，中国政府并不希望进一步提高汽车进口关税。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美国对华出口的大豆和飞机——在中国进口的大豆和飞机中，分别有 41% 和 63% 来自美国。当然，中国可以寻找其他卖家来替代美国，但这种做法在经济上是否划算就很难说了。另外，考虑到中国庞大的需求，其是否能在海外找到足够的卖家来替代美国也是一大问题。如果这些制裁措施最终导致中国国内要素价格上涨，推高通胀水平，那么中国也将伤及自身利益。

总结来说，我们认为美方在这场贸易争端中的核心目标并不是降低与中国贸易的逆差水平，而是试图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进一步的技术进步。显然，这是一项中国政府绝不会妥协的议题，因为技术进步对于中国实现其“中国制造 2025”计划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同时也发现，尽管做出了对等的报复措施，但中国政府也在试图将报复的成本限制到最低水平，其具体的做法就是将报复的商品限制在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上。很明显，中美双方都明智地抓住了对方的痛点——美国针对的是中国未来的技术进步；而中国则回应以打击美国的大宗商品出口。我们不难发现，面对中国准确的报复措施，特朗普必然迅速加以回应。在目前这种环境下，中美双方都难以做出让步，同时也都缺乏缓和局势的切入点。

本文原题为“[What Are the Targets in the US-China Trade War?](#)”。本文作者 Alicia Garcia Herrero 是欧洲智库 Bruegel 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同时是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副教授。本文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贸易战的最大危害是什么？

James A. Haley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中美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引起了各界的广泛担忧。在上周的演讲中，IMF 总裁拉加德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忧虑。作者认为，危害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还不是全面贸易战将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贸易战对人类社会最大的威胁，是其可能颠覆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国际秩序，从而使世界各国再次陷入冲突与混乱之中。全文如下：

最近几周以来，中美之间针锋相对的贸易摩擦正在迅速升温，使得全球股票市场普遍出现波动。市场对美国新增关税和中国报复措施反应的背后，是对贸易保护主义挫伤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担忧。中美双方威胁将贸易战进一步升温的言论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这其中就包括 IMF 总裁拉加德。在今年 4 月的 IMF 春季年会召开前，拉加德罕见地表达了对贸易战损害互利共赢的国际贸易体系的担忧。通常而言，考虑到 IMF 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影响，拉加德的公开言论都是委婉而富有语言艺术的。但在上周的开幕演讲中，拉加德罕见地点出了 IMF 三大成员国的名——她表达了对美国和中国提高关税的担忧，并且对德国庞大的贸易盈余规模提出了批评。

笔者认为，拉加德的此番言论在如今这个多事之秋有着重要的意义。她的工作应当是守卫和发展如今这套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从而使全球数以十亿计的百姓从中受益。从某种意义上讲，拉加德在国际贸易这场游戏中扮演着裁判的角色。既然游戏里最大的玩家有越界行为，作为裁判她理应提出警告。在现实世界中，拉加德确实有一条明确的总裁指责：“确保 IMF 成员国不采取任何破坏国内或全球经济繁荣的毁灭性政策。”发动贸易战，无疑就是这样的一种“毁灭性政策”。原因也非常简单——要想赢得贸易战，必须要有人付出代价，而贸易战的代价往往是由其国内的部分居民承担的。

就在不久以前，特朗普公开宣称：“贸易战不仅对我们有利，而且我们可以轻松取胜。”但现在，面对中国迅猛的报复措施，特朗普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先前发出的威胁，并表示将再度审议是否重返 TPP（现在 TPP 有了一个新名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综合改进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确，贸易战不是那么好打的。如果贸易战的成本真的那么容易控制，那联邦政府又为什么在尝试各种手段——其中甚至包括有大萧条时期的老方法——来给美国农民补贴，从而避免其受到中国报复措施的伤害呢？

当然，这些大萧条时期的政策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馈中西部农村的特朗普支持者。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政策意味着产品市场上的扭曲，而这种扭曲

可能伤害到全世界的经济健康。那些被伤害的国家和企业将会作何反应呢？在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人进行反击。一旦这种反击形成连锁效应，那么臭名昭著的 1930 年 Smoot-Hawley 关税法案的灾难后果可能会在今日重演。尽管 Smoot-Hawley 关税法案并没有直接导致大萧条，但这一法案却间接导致了上世纪 30 年代早期世界经济停滞，并最终使世界走向了大战的悲剧命运。

二战结束后，正是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世界各主要国家才共同成立了 IMF，以帮助确保其成员国不再采取这样灾难性的保护主义政策。自成立以来，IMF 一向致力于在国家间推行相应的贸易调整政策，来避免全球贸易长期失衡，并从源头防止关税大战的双输局面。在过去半个世纪里，IMF 的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过去，不少人认为世界经济是一场零和游戏。而在 IMF 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发现，所有人都可以从经济增长和全球化中获益。

但是，正如拉加德向我们警告的，这套互利共赢的国际贸易体系，正面临十分危急的局面。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全世界的证券市场都对中美间的关税大战做出了负面的反应。事实上，在所有贸易战可能导致的后果中，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还不是最致命的一条。贸易摩擦中的参与方可能采取各种灾难性的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的恶果可能要过上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被大众所普遍认知。简单来说，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在过去 70 年间煞费苦心构建的这套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不仅促进了全球的经济繁荣，还使得这个世界更为安全、稳定、和平。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政府一向支持 IMF 采取各种手段，避免临时性冲击对全球经济造成永久性损伤。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70 年后的今天美国政府再一次倒退回“美国优先”的老路。显然，这将损害 IMF 稳定全球经济，预测和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

在她的开幕演讲中，拉加德指出隐约可见的全面贸易战很可能导致长期的全球经济萧条。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人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所经历的惨痛历史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特朗普政府无知和莽撞的政策，可能导致灾难性的、不可挽回的后果。

本文原题为“What Is at Stake in a Trade War?”。本文作者 James A. Haley 是加拿大智库全球治理创新中心（CIGI）的资深研究员。本文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财政刺激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J é r é m i e C o h e n - S e t t o n, E g o r G o r n o s t a y 和 C o l o m b e L a d r e i t d e L a c h a r r i è r e/文 熊春婷/编译
 导读：2017年年底在美国颁布的大幅减税政策和今年2月颁布的一揽子支出计划预计将为美国今年的经济增加276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占GDP的1.4%，但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可能会低于当前水平。正如这篇博客所述，财政刺激对经济活动和产出的影响随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变动。对特朗普刺激措施影响（即“乘数效应”影响）的现有预测忽略了一个事实——美国经济几乎已经充分发挥了潜力。根据美国当前经济状况，如果不考虑这一维度的话，我们预测到2020年，特朗普财政刺激措施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额外再增长0.5%而不是2.1%。编译如下：

税收和支出措施对预算的影响

总统特朗普分别在2017年12月22日和2018年9月9日签署了减税和就业法案（TCJA）以及两党预算法案（BBA）。作为美国国会的无党派委员会，税务联合委员会（2017）估计：通过大幅削减个人、传递企业和公司的法定税率，TCJA法案将使得2018年财政预算赤字增加1,360亿美元，2019年赤字增加2,800亿美元。换算成历年，在2018年这相当于2060亿美元，几乎占GDP的1.1%，在2019年相当于2,750亿美元，占GDP的1.4%（表1）。宏观经济顾问（2018年）估计：通过提高2018年和2019财政年度的酌情预算权限的“上限”，提供灾难救助，并授权为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再提供4年的资金，BBA法案将进一步提高2018年的预算赤字至700亿，占GDP的0.36%。因此，总体估计TCJA和BBA法案在2018年将实现276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占GDP的1.4%（表1）。

表 1 对预算平衡的影响

刺激计划	2018	2019	2020
TCJA (十亿美元, FY)	-135.7	-280	-258.8
TCJA (十亿美元, CY)	-205.7	-274.7	-249.3
TCJA (十亿美元, 占 2017 年 GDP 比例, CY)	-1.06	-1.42	-1.29
BBA (十亿美元, CY)	-70	-85	-85
BBA (占 2017 年 GDP 比例, CY)	-0.36	-0.44	-0.44
总计 (占 2017 年 GDP 比例, CY)	-275.7	-359.7	-334.3
总计 (十亿美元, CY)	-1.42	-1.86	-1.72

CY: 日历年; FY: 财年

注：2017年GDP为\$19.3868万亿（经济分析局，2018年1月26日）；TCJA的日历年估算按照如下公式： $CY[2018] = FY[2018] + .25 * FY[2019]$ 。否则， $CY[t] = 0.75 * FY[t] + .25 * FY[t+1]$ 。

来源：TCJA 的财年数据来源于税收联合委员会（2017）；BBA 财年数据来源于宏观经济顾问（2018）；作者使用上述公式计算了 TCJA 的日历年数据

平均乘子的巨大影响

我们现从一个简单的类似于 Mertens (2018) 的框架开始分析，该框架表明： γ_h 表示在时期 t 财政政策改变 Δfp_t 对 GDP 增长的因果影响，具体如下式所示：

$$1、\Delta y_{t+h} = \gamma_h \Delta fp_t + \Delta \bar{y}_{t+h}$$

Δy_{t+h} 表示 $h \geq 0$ 年之后的观察到的未来经济增长； $\Delta \bar{y}_{t+h}$ 表示在没有才财政政策变化情况下的反事实未来增长。

从回归基准模型中可得到关于 γ_h 的估计值，该基准模型研究历史上财政政策变化。和更多的结构化的方法相比，这种方法的主要优势是不需要制定明确的行为和均衡假设。特别是，对于预期的未来税率，不需要假设具体的动态，而是成为预测的一部分。

该回归基准方法的关键难点是同时性。考虑到财政政策的变化不是太大，作为对现在或预期的周期条件。关于 y_{t+h} 对于所有财政政策的变化影响的回归将会导致参数 h 的不一致性。因此，该想法研究了财政政策的变化是 quasi 随机的还是外生。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财政政策的因果影响作为最小二乘估计。考虑到即使财政政策针对当前或预期的周期性条件没有作出大幅度变化，对财政政策的所有变化 Δy_{t+h} 做一个单纯的回归将导致对参数 γ_h 估计的不一致。因此，该想法是利用了准随机或“外生”财政政策的变化， Δfp_t^{exo}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在形式回归中对 σ_h 做最小二乘估计从而得到财政政策的因果效应：

$$2、\Delta y_{t+h} = \sigma_h \Delta fp_t^{exo} + \Delta u_{t+h}$$

和等式（2）相类似，表 2 中的面板数据 A 报告了由直接回归得到的关于线性财政乘数的不同估计。前三行重现了 Mertens（2018）中使用的线性乘数。将这些税收乘数的平均值（ $\sigma_h = -1.56$ ）应用于 TCJA 法案的预计收入影响（ τ_t 表

示由 TCJA 法案引起的税务负债的变化，

$\Delta fp_i^{exo} = \Delta \tau_i$ = 第一年即 2017 年 GDP 的 -1.06%)，Mertens (2018) 发现直至 2020 年底，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增长 1.65%，其中大部分的增长发生在 2018 年前。²

面板 A 数据的第四行介绍了我们自己对战后时期 OECD 经济体大规模财政扩张进行实证研究所得到的的财政乘数 (Cohen-Setton, Gornostay 和 Ladreit, 2018 年)。³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发现，从 1960 年至 2007 年间，通过考虑周期性调整的财政余额大幅下降，16 个 OECD 国家的所组成的面板数据面临着大幅度的财政扩张。然后，我们确定了财政扩张不受反周期因素的激励，并将其用于类似于公式 (2) 的估计中。正如 Mertens (2018) 一样，我们的线性乘数预测到 2020 年底 GDP 会大幅增长 1.36%。

用乘数表示与经济状况相关的小效应

然而，这些预测未能说明财政乘数可能会随商业周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最近的一篇文献在政府支出乘数的背景下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使乘数依赖于经济状况的机制仅适用于政府支出的变化。表 2 的面板数据 B 中报告被称为“依赖于状态”的乘数，改乘数来源于两篇最近的研究

(Auerbach 和 Gorodnichenko, 2012, Ramey 和 Zubairy, 2018) 和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的乘数相对于这两项研究的一个优势是，隐含于我们的模型估算的财政政策更接近 TCJA 和 BBA。

表 2 财政乘数估计

(第一年实际 GDP 增长的百分点变化为 1% 的国内生产总值变化)

研究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总计	财政变化种类/
----	-------	-------	-------	----	---------

² Mertens (2018) 的核心估计是：TCJA 法案将在 2020 年底前将 GDP 的水平提高 1.3%。这个数字是通过将相同的财政刺激 (GDP 的 -1.1%) 应用于由六项研究进行平均所得到的税收乘数而获得的：其中三项如表 1 所示，使用直接回归模型，另外三项研究使用结构载体自回归 (SVAR) 模型。在 Cohen-Setton, Gornostay 和 Ladreit (2018) 中，我们遵循直接回归法，因此我们的比较限制在由 Mertens (2018) 的直接回归模型中所得出的估计值。

³ 作者可应要求提供该论文的草稿。

					状态
A. 线性税收乘子					
Romer & Romer (2010)	-1.27	-0.78	-0.54	-2.59	税收/未使用
Favero & Giavazzi (2012)	-1.16	0.10	0.29	-0.77	税收/未使用
Mertens & Ravn (2012)	-1.24	-1.10	1.02	-1.31	税收/未使用
Cohen-Setton, Gornostay, & Ladreit (2018)					
	-0.39	-0.57	-0.32	-1.28	刺激/未使用
<i>不算 Cohen-Setton, Gornostay, & Ladreit (2018) 的平均</i>					
	-1.22	-0.59	0.26	-1.56	
<i>加上 Cohen-Setton, Gornostay, & Ladreit (2018) 的平均</i>					
	-1.01	-0.59	0.11	-1.49	
B. 状态依赖乘子					
萧条状态					
Auerbach & Gorodnichenko (2012)	-0.91	-0.50	-0.30	-1.70	开支/衰退
Ramey & Zubairy (2018)	-0.22	-0.38	-0.04	-0.64	开支/宽松
Cohen-Setton, Gornostay, & Ladreit (2018)	-0.34	-0.51	-0.73	-1.57	刺激/衰退
Cohen-Setton, Gornostay, & Ladreit (2018)	-0.67	-0.48	-0.32	-1.47	刺激/宽松
<i>平均</i>	-0.54	-0.47	-0.35	-1.35	
繁荣状态					
Auerbach & Gorodnichenko (2012)	-0.15	0.03	0.08	-0.05	开支/扩张
Ramey & Zubairy (2018)	-0.71	0.12	-0.08	-0.68	开支/非宽松
Cohen-Setton, Gornostay, & Ladreit (2018)	0.31	-0.38	0.20	0.14	刺激/扩张
Cohen-Setton, Gornostay, & Ladreit (2018)	-0.32	-0.46	-0.11	-0.89	刺激/非宽松

平均	-0.22	-0.17	0.02	-0.37	

来源：Mertens (2018); Auerbach and Gorodnichenko (2012); Ramey and Zubairy (2018); 和 作者的计算。

正如 Auerbach and Gorodnichenko (2012) 一样，我们发现（累积）乘数在不好的状态下大于等于 1，但是在好的状态下乘数很小。如表 3 所示，考虑到目前美国的经济状况会产生关于 TCJA 和 BBA 的估计影响的一阶差异。状态依赖型乘数促使的产出增长仅为线性乘数预测的增长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该线性乘数不考虑商业周期阶段。人们可能不赞同状态依赖型乘数更好，或者是不同意美国劳动力市场是否仍然萧条，但是在评估特朗普财政计划的可能影响时假设经济状态是错误的。

表 3 关于 TCJA 和 BBC 影响的概括性结果

（相对于美国实际 GDP 反增长的百分点）

财政乘数	2018	2019	2020	总计
TCJA 的影响				
使用线性乘数	1.08	0.62	-0.12	1.58
使用状态依赖乘数	0.23	0.18	-0.02	0.39
BBA 的影响				
使用线性乘数	0.37	0.21	-0.04	0.54
使用状态依赖乘数	0.08	0.06	-0.01	0.13
TCJA 和 BBA 的影响				
使用线性乘数	1.44	0.83	-0.16	2.11
使用状态依赖乘数	0.31	0.24	-0.03	0.52

来源：作者计算得到

本文原题为“Impact of the Trump Fiscal Stimulus on US Economic Growth”。本文作者 J r mie Cohen-Setton 是 PIIE 的研究员，Egor Gornostay 和 Colombe Ladreit de Lacharri r 是 PIIE 的研究分析员。本文于 2018 年 4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合资企业和技术转让：来自中国的新证据

Kun Jiang、Wolfgang Keller、Larry D. Qiu 和 William Ridley/文 朱友明/编译

导读：中国政府要求某些行业的外国投资者与国内企业组建合资企业。该专栏使用了 1998 年至 2007 年在中国所有合资企业的数据，表明在鼓励外国投资者转移技术方面这项政策取得的成功。本文发现有三种渠道可以通过合资企业实现国际技术转移。编译如下：

2018 年 3 月 22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计划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600 亿美元的关税。与此同时，这件事升级了中国政府在制定关于外国投资者知识产权的官方政策方面一直以来的争端。美国贸易代表 Robert Lighthizer 声称，中国在“国家层面主导的以强硬手段窃取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行为”是不合法的。调查结果中有美国政府对不公平的中国贸易行为的主张，详细说明见 301 条款调查（这里是执行摘要）。

USTR 报告认为，中国对所有权和技术许可使用采取繁重的限制，迫使外国投资者将先进技术转让给国内公司。限制尤其体现在特定行业组建国际合资企业（IJVS）的建立上。这些行业通常广泛使用专有技术、知识产权和先进的生产方法，例如制药或汽车生产。

近年来，中国在特定行业内关于外国投资者与国内合作伙伴成立合资企业的要求已放松，外商独资企业增多，但国际合资企业每年仍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国际合资企业也为外国技术和实践传播到中国提供了独特的环境。

在本专栏中，我们重点关注在化国际合资企业相关的问题，这是中国获得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途径之一。我们研究了外国公司建立这种类型合资公司的动机，以合资公司的中外投资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一、外商直接投资，合资企业和技术转让

外国投资者有清晰的激励动机来组建合资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时，当地国合作伙伴可以帮助外国伙伴应对复杂性问题，如监管政策、文化适应等。现有的研究指出了合资企业中理想的国内合作伙伴的特征：既定的市场份额，强创新能力或强出口导向（Kogut, 1988; Geringer, 1991）。但这些早期文献并未进行严谨的实证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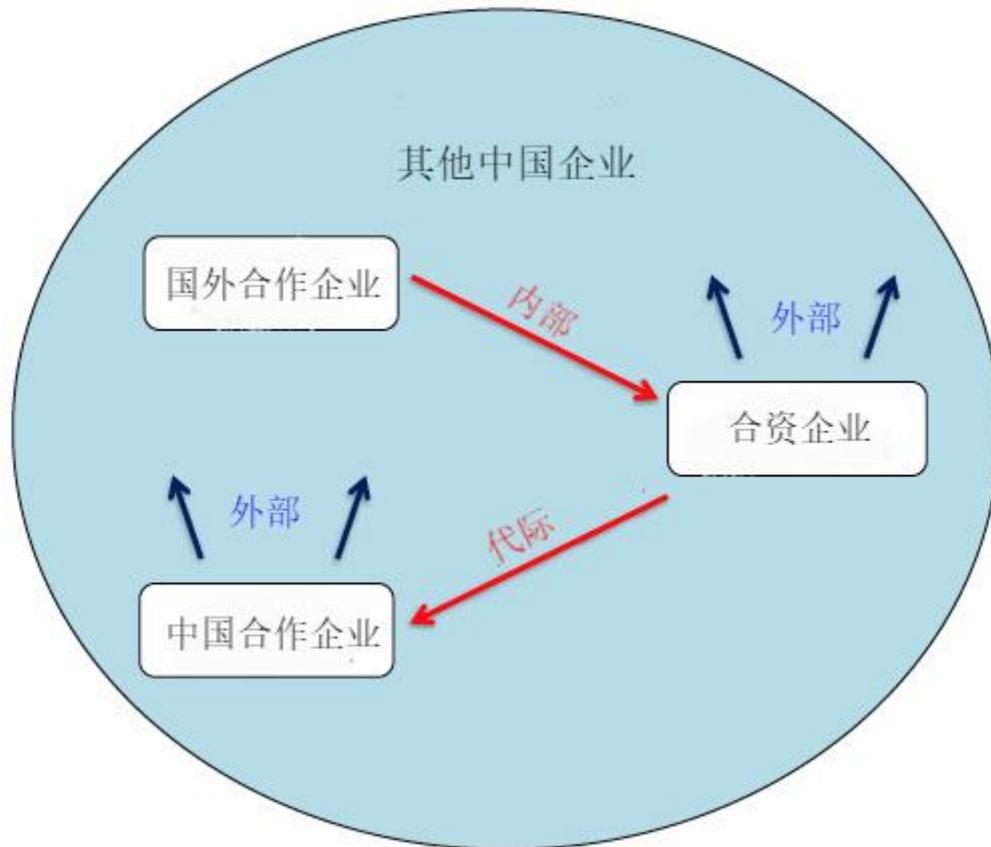
对于东道国来说，授权合资企业（或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论据也是公认的：外国跨国公司能够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专长。决策者希望国内公司能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从中受益。

关于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技术转让的划时代研究（Javorcik, 2004; Keller, Yeaple, 2009）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在产业层面产生了广泛的学习外部性，因为跨国企业将其技术和方法转移到目的地市场。这些创新直接或间接地扩散到国内

公司。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这些企业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参与了更多的创新。

外国直接投资也可能导致负面影响，如国外竞争压力削弱了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创新能力。

作为特殊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企业模式，国际合资企业和其他类型的 FDI 企业的影响是相同的吗？在我们最近的工作中（江，2018），我们提出了几种可能发生技术国际传播的渠道（图 1）。



资料来源：江（2018）

我们可以预期新成立的合资企业将在技术上和经营上从公司的外国投资人处受益。受益的第一个渠道是内部技术转让：外国合伙公司为合资企业的利益提供专有技术，技术或知识产权。这是因为它希望新项目能够取得成功，抑或是受到了法规的约束。

随着技术向中国合伙公司泄漏（转让知识产权或劳动力跳槽），中资公司可能会从中获益。我们称之为代际技术转移效应。

最后，根据关于外国直接投资产生的外部性的大量文献，我们考虑了国际投资合资企业形成的外部影响。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思考，合资企业在渗透入产业的同时也传播了国外的技术，这一过程是否会影响到合资企业之外的公司。这些渠道的存在及其影响的程度便是我们应该调查的实证性问题。

二、合作人选择和技术转移的实证分析

为在计量经济学框架中的解释上述问题，我们使用了一个新的行政数据库，样本包括了从 1998 年到 2007 年在中国所有合资企业。我们的数据库包含由所有的 IJV、国内中国合作伙伴公司和其他中国公司，这些公司在样本期年销售额至少为 500 万元人民币（79.5 万美元）。

我们研究哪些中国公司最有可能被选为 IJV 合作伙伴。根据关于合资企业形成决定因素的早期文献的预测，我们发现最有可能被选为 IJV 合伙人的中国企业都是规模更大，效率更高，并且参与更多的创新和专利的中国企业。这并不令人意外，但是这些创新能力强的大型生产性企业将具有吸收能力的公司（Cohen, Levinthal 1990），并更容易受益于代际技术转移效应。

接下来，我们考察三种技术转移渠道的证据。

•内部：如果外国投资者与合资企业之间存在内部技术转移渠道，我们希望能够观察到合资企业在生产力、创新和市场份额等方面的高度表现。从平均角度来看，事实和我们的假设保持了一致。控制其他企业的特征，按照全要素生产率衡量，合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往往提高 30%。合资企业有更高的销售额，并且比非合资企业拥有更多的专利。这一点印证了技术转移的外部溢出效应。

•代际：中国投资人方面也可以发现类似结论，虽然不如外投资人显著。中资投资人自身企业的生产力仅比其他普通中国公司高出 5% 左右。虽然外国投资者有强烈的动力将技术直接转让给合资企业，但是它们没有这样的动力把技术转让给中资投资人。

•外部：IJV 整体的外部效应一方面表现为技术溢出效应，通过广泛的学习效应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表现市场份额竞争效应，高竞争里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减少了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我们的估计表明，学习效应通常占主导地位。当合资企业（或合资公司国内投资人所在企业）在特定行业占有较大份额的市场时，其他中国公司的生产力方面显著提高。平均而言，当合资企业的行业销售份额增加 10 个百分点时，该行业的其他企业的生产率提高 10%。对于国内合作伙伴产生的影响，IJV 合作伙伴在行业销售额中的份额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其他公司的生产率提高了约 4.5%。外国投资者的国别很重要。我们将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投资者与日本以及美国进行比较。我们发现美国的合资企业贡献的外部性最多。

三、合资企业和外国直接投资政策

美国决策层对中国的对外投资政策表示不满，认为中国从对合资企业的政策限制中获得潜在收益。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外合资企业这种组织形式确实对中国境内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来自境外投资人也来自境内投资人。我

们发现国际技术转移通过三个渠道进行。文章的结论对一国制定最佳外国投资政策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原题为“Joint Venture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New Evidence from China”。本文作者 Kun Jiang 为诺丁汉大学助理教授，Wolfgang Keller 为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得分校教授，Larry D. Qiu 为香港大学教授，William Ridley 为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得分校博士。本文于 2018 年 4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发表五十周年回望

Silvia Merler/文 安婧宜/编译

导读：1968年三月，在美国经济学会就职演说之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的作用》刊登在《美国经济评论》上。五十年过去了，经济学家们仍在反思这篇著名的文章。

Gregory Mankiw and Ricardo Reis 认为在长期，宏观预期、菲利普斯曲线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与限制已经被充分研究过了。在未来，2008-2009年衰退后的经济会重新验证弗里德曼关于自然利率的假说。此时，最简单的解释是，停滞是由于经济周期内的生产力水平放缓产生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可能通过滞后效应或总需求的长期短缺效应与弗里德曼关于长期的经典理论相违背。未来的研究可能会与弗里德曼的观点不谋而合，并转向建模以更好地理解菲利普斯曲线，从而建立一个更好的指标来代替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假说。**Gregory Mankiw and Ricardo Reis** 认为今天货币政策的作用已经远远背离了弗里德曼强调的内容。未来，以下四个方面会有长足进展：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银行储蓄的作用，零息利率及金融稳定性。

Olivier Blanchard 在考虑我们是否应该拒绝自然利率假说。尽管事实并不支持这个假说，它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规则了。它被中央银行采用，也是今天央行采用的通货导向的经济政策的基础。近期，关于这个假设的质疑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都与经济危机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有关。首先，经济危机及随后的经济衰退似乎对产出水平产生了长期影响。其次，与假设相反，高失业率并未降低通货膨胀或者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水平。他认为宏观和微观经济证据表明自然利率假说存在问题。政策制定者可以把自然利率假说作为他们的原假设，但也应该关注其他备择假设。

Robert Hall and Thomas Sargent 认为，该演讲的短期作用是检验弗里德曼的论断——预期通胀水平不仅对实际通胀率产生影响，而且是一比一地对实际通胀率产生影响。在菲利普斯曲线的框架内，如弗里德曼指出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而且中央银行的通胀选择不会影响失业率和其它指标。在较长期，弗里德曼的一比一假设得到了经济学家的全面支持。而失业率、就业率和产出与货币政策无关的论断开始被接受了，逐步代替了货币中性的概念。他们认为弗里德曼的主要观点是关于长期产出的假说，它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广泛传播，因为许多经济体的实践都为这一假说提供了证据。接下来的研究也修正了弗里德曼关于传导效应的观点，但他们认为这一假说仍然站得住脚，尽管菲利普斯曲线在宏观模型中并不能实现。

John Cochrane 发表长文，讨论弗里德曼的贡献，其重点在“中性与非中性”：货币政策在长期是中性的而非短期。但弗里德曼关于 1980 年代的动荡和后续的低通胀会怎么说？他会怎么将泰勒关于利率不是一比一影响通胀的创新放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中，从而稳定 1980 年的价格水平？Cochrane 认为尽管这一事件发生了，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政策的观点仍然产生了长足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体现在菲利普斯曲线上。中央银行在短期内对通胀和宏观经济的控制是强有力的。这一观点目前来看是被普遍接受的，但弗里德曼提醒我们那不总是正确的。现在，美联储被认为是长期利率变化、汇率水平、股票市场、商品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动因。而美联储内外的声音都开始关注劳动力参与率、不平等和其他问题。人类总是倾向于寻求机构的控制，让一部分人掌握经济命脉。Cochrane 认为我们应该回望过去，削减美联储的权利。

Edward Nelson 则讨论了弗里德曼文章的七个漏洞：

(1) 《货币政策的作用》是弗里德曼首次公开发表并提出自然利率假说的文章。

(2) 弗里德曼的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在 1960 年被 Samuelson and Solow 提出。

(3) 弗里德曼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阐述是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和价格刚性假设的。

(4) 弗里德曼（1968）所记录的大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与历史相反。

(5) 弗里德曼（1968）认为货币增发会使得失业率与实际利率水平在 20 年内低于正常水平。

(6) 名义利率的下限为零与自然利率假说不符。

(7) 弗里德曼（1968）利率锚的概念被理性预期否定了。

这一讨论阐述了为什么这七点存在漏洞，并讨论了弗里德曼理论框架下的主要概念。

本文原题为“Milton Friedman’s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50 Years Later”。本文是作者是 Silvia Merler，为 PIIE 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8 年 4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板门店和谈：新的开始还是旧事幻现？

Scott A. Snyder /文 丁丽伟/编译

导读：当地时间4月27日，朝韩首脑会晤在板门店举行。金正恩与文在寅进行了热情洋溢的会谈，表示积极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合作，实现半岛发展。本文作者认为，并不能由此就判断出朝鲜半岛就此出现和平发展的新局面，还将面临现实的考验，而这需要美国方面的配合，也可能需要中国。

金正恩在板门店越过南北朝鲜分界线，进入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并受到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热烈欢迎。他们在此像好邻居一样闲聊，这里是几十年来朝鲜半岛对峙的象征性中心。在他们还没在板门店宣言中宣布朝韩和平及联合的时候，他们一起栽了一棵树，喝了杯茶。

这种气氛让人想起了2000年6月13日至15日在平壤由金大中和金正日举行的首次朝韩首脑会晤，开启了朝韩合作的时代，但并没有最终解决双方之间的军事紧张关系，也没有停止朝鲜的核武器计划。这次的开场会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答案在于两国的动机以及他们所面临的环境。

金正恩现身的派对

就像他的父亲金正日一样，金正恩实际上有效利用了与韩国的开放，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人的面孔，而不是通常的关于金氏的叙事——日益加剧的威胁和向他的民众无情索取政治忠诚。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的是“朝鲜民族团结”，而不是“统一”，随着他表示优先发展国家经济，金正恩出人意料地表明了其国家的经济缺陷。尽管有许多相同的动机，金正恩还是比他的父亲显示得更灵活、更务实。

金正恩戏剧性地缓解与韩国的紧张局势的动机是多方面的：缓解来自美方的压力；重新打开利于其经济发展的经济交流；利用韩国抵抗来自美国的可能升级的军事冲突

文在寅对和平的出价

文在寅利用此次峰会重新启动了与朝鲜的和解。他试图将金正恩拉出来，并将其与在安全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制度进程捆绑在一起。“板门店宣言”重申了之前所有主要的朝韩宣言的内容，包括2007年10月4日朝鲜前总统卢武铉和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之间的朝韩宣言中包含的雄心勃勃的经济承诺。板门店会议建立在事先声明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制度化进程来约束朝鲜。

通过《板门店宣言》，韩国试图通过恢复家庭团聚和在开城设立一间朝韩联络处来规范朝韩之间的交流，并推动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时间表的实现来建立永久和平。朝鲜传统上把无核化问题作为美国的一个问题，声明中提到无核化是为特朗普-金正日峰会做准备的一种方式——这是文在寅迫切需要的，如果他在朝鲜半岛建立和平的努力要成功的话。

也许检验文在寅倡议是否会产生立竿见影且持久的效果的最重要的试金石，是两个朝鲜减少军事紧张对峙的承诺。通过成立西海海上和平区域来建立信任措施的努力将会开启未来几周朝韩间军事会谈的进展，这将需要驻韩美军的支持来有效实施。此外，以永久和平机制取代朝鲜停战的谈判将需要与美国、可能还有中国的密切协调。

文在寅在峰会前的简报中强调了同时改善南北关系和美朝关系的重要性。通过设置早日宣布结束战争这一耀眼的目标，首尔方面加大了对朝鲜和美国的压力，要求其无核化设定一个雄心勃勃的时间表。但是，确保朝鲜无核化的全面核查和核查过程，可能要比“板门店宣言”希望在年底结束和平谈判的愿望要长得多。有必要对这两个进程进行调整，以确保它们不会成为华盛顿和首尔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

在注意力已经转向为特朗普-金正恩会谈做准备工作之际，美国和朝鲜之间能够用于营造氛围的经验和善意显然大大少于南北朝鲜之间。正如金大中在2001年早期发现自己暴露于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更替带来的美国政策的戏剧性转变之中，没人能够确切地说出唐纳德·特朗普会如何行动。尽管特朗普和金正恩都有兴趣发表一个全面的声明来标志这一双边关系的历史性时刻，但在金正恩尚未对接受一个迅速无核化的进程作出进一步承诺的情况下，双方协作的余地并不大。

对朝鲜而言，任何此类步骤都跟改善与美关系挂钩，这不仅仅是与特朗普总统的一次会面和问候。美国对金正恩及朝鲜的怀疑与不信任不断加深，而且只会在实质性的和具体的弃核步骤之后才可能扭转。此外，人权问题恐怕会被提出，在国会成为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并可能给朝鲜提供一个违反弃核承诺的借口，并在美韩同盟之间造成裂痕。

本文原题为“Peace Talk at Panmunjom: A New Opening Or Déjà vu?”。本文作者为 Scott A. Snyder，是朝鲜研究高级研究员和美朝政策项目主任。本文刊于2018年4月27日CFR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面临危机的准则:持续使用化学武器的影响

Natasha Lander /文 曹园/编译

导读: 日前, 叙利亚境内杜马地区发生使用化武并造成平民伤亡事件的报道, 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俄罗斯认为此次袭击事件系凭空捏造, 对此, 禁化武组织已经要求事实调查组对有关报道进行调查。作者认为, 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准则正在面临危机, 人类即将倒退回一个充满非人道的战争工具的时代。国际社会应当寻求更为有效的办法, 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阻止进一步的化学武器袭击。编译如下:

据报道, 最近在叙利亚杜马镇发生的氯气袭击事件导致 40 多名男子、妇女和儿童死亡, 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这次袭击, 联合国安理会也召开了紧急会议。俄罗斯则认为有关此次袭击事件的报道是虚假的, 并对美国进行了言语攻击。

这次袭击对叙利亚人民来说是可怕的, 其全球影响不容忽视。这已不再是一种反常现象, 它是叙利亚、朝鲜、俄罗斯和 ISIS 的最新攻击模式。这些行为者已经表明他们会使用许多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努力遏制的武器来藐视国际公约。然而, 目前我们还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追究化学武器袭击者的责任。

多年来, 专家们一直认为, 包括叙利亚和俄罗斯在内的将近 200 个签署国的《化学武器公约》(CWC) 可能陷入危机。目前化学武器使用率的增加引发了这样一个疑问, 即它们是否正在成为一种默认战争武器?

2013 年, 古塔沙林毒气袭击促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外交努力, 旨在清除叙利亚已申报的化学武器。这项努力最初被认为是成功的, 后来叙利亚在 2014 年开始使用氯气作为战争武器, 并于 2017 年发动了另一次沙林毒气袭击。在此期间, ISIS 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了氯气和芥子气袭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长兄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 VX 神经毒剂暗杀。上个月, 一名前俄罗斯特工和他的女儿以及其他几个旁观者在英国被一种新型神经毒剂毒死。俄罗斯被认为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 尽管莫斯科方面否认与该事件有任何牵连。

国际社会不愿意付出足够强大的代价来阻止这些行为者进一步使用化学武器。美国、欧盟和其他美国盟国自 2012 年以来一直对那些被控使用化学武器的人实施制裁, 一个名为“消除使用化学武器有罪不罚现象”的新组织对这些制裁进行了追踪。这份清单包括美国对叙利亚政府成员实施的制裁。

针对俄罗斯最近在英国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 美国驱逐了俄罗斯外交官, 并关闭了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还有二十多个国家也做出了相似制裁。这些反应

和措施向肇事者释放了重要的象征性信号，即他们的行动会产生后果，尽管这还没有严厉到足以阻止继续使用化学武器。

目前的努力不足以避免不断恶化的危机，阻止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或俄罗斯或朝鲜）政权的选择也可能是不可取的。由于俄罗斯否认叙利亚参与这些袭击事件，联合国的行动不断受到阻碍，美国和志同道合的盟友可能会组成一个追求军事选择的联盟。如果不使用武力，这些盟国和其他国家可以继续实施制裁。盟国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地反驳俄罗斯的说法，即这些攻击是由叙利亚政府的反对派所为，或者该事件是虚假的报道。提供侦查设备和协助进行法医调查也有助于揭露真相。

多年来，美国人的意识发生了变化——古巴导弹危机、洛克比空难、9·11事件——都促使美国人团结起来，但仅仅震惊和担忧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采取更为具体的行动。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准则同样处于关键时期。国际社会何时才能认识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和制裁的作用是有限的？

事实上，我们长期坚持的准则正在瓦解，人类即将倒退回一个充满非人道的战争工具的时代。因此，国际社会应寻求更为有效的办法，追究肇事者的责任，阻止进一步的化学武器袭击。

本文原题为“A Norm in Crisis: Implications of Persistent Chemical Weapons Use”。本文作者为美国兰德公司高级政策分析师Natasha Lander。本文刊于2018年4月18日RAND官网。

[单击此处可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的缺席可能使美洲峰会免于困境

Shannon K. O'Neil / 文 丁丽伟 / 编译

导读：当地时间4月13日，第八届美洲峰会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由于近年来拉美地区高涨的反腐形势，“反腐败”成为本次峰会的主题。然而，美国作为曾经大力支持拉美地区反腐活动的国家，其总统特朗普借故缺席了此次峰会。本文作者认为，特朗普执政以来已经明显削减了在反腐方面的工作力度，但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总统的缺席将不会影响拉美地区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尽管步伐缓慢，拉美国家将在选民的推动下更多地实现本届峰会的反腐承诺。

周五，西半球的总统们齐聚秘鲁首都利马，参加第八届美洲峰会。然而，少了唐纳德·特朗普。尽管他的缺席可能使峰会少了许多头条，但也可能给本届峰会的主题议题——反腐败——带来更多的进展。不止特朗普本人在这一问题上有自己的偏见，他的政府也减少了美国对这一历史性变革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不稳定，却通向真正的改变。

毫无疑问，东道主秘鲁政府卷入的一系列丑闻，为峰会议题提供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背景。秘鲁总统刚刚因为从巴西建筑业巨头奥德布雷希特（Odebrecht SA）拿钱以及收买投票以避免弹劾的指控而辞职。许多与会者，包括巴西和墨西哥总统，都各自因为贪污、妨碍司法公正和受贿的指控而面上无光。

这些案件仅仅涉及到每年从公共财政流向私人口袋手中的数百亿美元中的一部分，这些资金占据了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等国财政和GDP中显著的一块。更广泛的影响是，这些公共部门腐败阻碍了激励机制，导致政府过度投资于基础设施而忽视了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构建。它破坏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和社会契约，诱发了逃税。

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拉丁美洲领导人开始谈论腐败了。并且在一些地方，在学者、司法官员、活动家和选民的推动下，政府终于开始有所行动了。

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民主的深化。信息自由法的影响在扩散——墨西哥于2002年通过，巴西在2011年，阿根廷在2016年，将曾经处于暗箱中的政府账本开放给公众审查。反过来，一个更自由的新闻业用这样那样的手段来调查和公开腐败行为：哥伦比亚国有炼油公司Ecopetrol的分支Reficar浪费的60亿美元，在阿根廷前总统部分拥有的酒店中进行的洗钱活动，熟练榨取墨西哥政府资金的“幽灵公司”。

更有效率的司法系统也加了分。在巴西，联邦警察、检察官和库里蒂巴市法官Sergio Moro的合作看起来不可动摇，他们已经扳倒了数十位领导人及前总统

卢拉。哥伦比亚司法部长内斯托·亨贝托·马丁内斯(Nestor Humberto Martinez)对 1600 多名涉嫌贪污的人提起诉讼，其中 500 人是政府官员。危地马拉司法部长西尔玛·阿尔达纳(Thelma Aldana)与联合国支持的反腐机构合作，发现了一项海关回扣计划，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抽走，导致危地马拉总统、副总统和许多其他官员被捕。在秘鲁，四位前总统因腐败和践踏人权而被宣判和监禁，或者潜逃。

这一切都来自于势不可挡的民众压力。如今的年代，每三个拉美人中就有两个参与选举，腐败已成为本地区的焦点问题，怒火会改变选民的行为。

美国曾是这一觉醒过程的一部分。美国国际发展署曾与本地区的政府一起对司法系统进行改革和改造。财政部投入资源追踪流入或经过美国银行系统的黑钱。司法部与该地区的同仁们密切合作，特别是对奥德布雷希特的调查，导致 26 亿美元的罚款以及几十位政商领导人受到惩处。

美国很可能不会在接下来的反腐斗争中发力。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从原来的立场后撤，过去一年里美国的海外反腐案件比奥巴马总统最后一个月还要少。在国务院内部，10 个最相关的职位中有 8 个仍然空缺，特朗普还提议削减大部分反腐败措施。国会的共和党人废除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包含通过要求能源和矿业公司公布向油矿资源国政府所支付的款项、来对付那些最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的内容。本周早些时候，峰会的与会者收到了一份尖锐的提醒，特朗普本人的利益冲突：为其家族企业工作的律师请求巴拿马总统介入一宗涉及巴拿马城特朗普酒店的法律案件中。

就算美国的作用没有衰退，峰会的承诺恐怕也会说得多、做得少。其关于反腐的公报将要求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增强检察官和法官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建立行为准则，保护监察人和线人，并运用技术来使日常技术更加透明和负责。

不过，尽管有改变腐败文化的美好呼吁，但推荐的措施中仅有少量会被广泛采纳或迅速实施。一些国家甚至还完全没有开始行动。另一些国家则已经出现了反腐形势的反弹，既得利益者和腐败政党不顾一切地保护他们的利益。

因此，反腐败斗争的真正进展还将主要依赖于选民。选举可能是一种生硬的手段，但迄今它们仍是保证官员们负责和——总有一天——促使他们履行首脑峰会广泛承诺的唯一途径。

本文原题为“Trump's No-Show May Lift Summit From Swamp”。本文作者为 Shannon K. O'Neil，是 CRF 副主席，拉美研究方向的“尼尔森与洛克菲勒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RAND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8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3 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